

略论美国学者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

吴原元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 魏斐德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和上海史研究专家,但他也曾涉足毛泽东研究领域。魏斐德之所以涉足毛泽东研究,主要是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与纪念其刚去世不久的导师列文森以及发现了与毛泽东相关的新史料等因素有关。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具有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鲜明的列文森范式等显著特点。也正因为魏斐德毛泽东研究方法的独特,他的毛泽东研究著作在美国学界备受争议。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启示我们,虽然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正是通过对相异观点与方法的了解、分析、批判和借鉴,将刺激我们的学术自省意识,进一步推动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

关键词: 魏斐德; 毛泽东; 研究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5-0041-07

On Wakeman's Study on MAO Zedong

WU Yuanyu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Frederic E. Wakeman is a famous American specialist on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y of Shanghai. But he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emorating Levinson, his tutor, who just passed away, 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 related to MAO Zedong. He has a uniqu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with clear Levinson's paradigm, etc. Based on Wakeman's research methods on MAO Zedong, his works on MAO Zedong in the U. S. A are controversial. Wakeman's study on MAO Zedong tells u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study perspective, awareness of problem, research methods and basic conclusions, but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analysis, criticism, reference, and absorbing beneficial nutritional can stimulate our academic self-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academic study of MAO Zedong the man and MAO Zedong's Thought.

Key words: Frederic E. Wakeman; MAO Zedong; study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 1937 ~ 2006) 是美国著名中国史和上海史研究专家,先后出版了《大门口的陌生人》、《控制与冲突》、《中华帝国的衰落》、《洪业》以及《上海警察》、《上海歹土》等著述。一直以中国明清史和上海史为主要关注领域的魏斐德,也曾涉足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版了《历史与意

收稿日期: 2012-05-20

作者简介: 吴原元(1977-) 男,江西东乡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美国中国学史。

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这部曾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争议的著作。魏斐德教授为何突然涉足毛泽东研究?他的毛泽东研究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在美国史学界引起巨大争议等问题,本文拟作一探讨,求教于方家。

一、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缘起

魏斐德教授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突然转向涉足毛泽东研究领域,当时国内外环境和局势的促动是主要因素之一。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波澜壮阔,黑人民权运动、高校青年学生运动、反战和平运动、女权运动、嬉皮士运动等汇成汹涌澎湃的激进洪流,势不可挡。特别是高校青年学生,为了彻底改造美国社会,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教育制度、社会问题、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掀起了一场全面的社会批判和改造运动。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环境无疑对魏斐德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1960年代晚期,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学生运动席卷全球。文革发生了。当然最关键的是1968年,正值巴黎事件爆发之时,美国的言论自由运动也导致了学生暴动、流血事件以及继之而来的军事管制。当时的加州州长里根命令军队开进加大校区,而伯克利加大的学生则力行抵抗。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对治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感受尤深。仅仅因为你教授中国历史,校园里的每一个毛泽东分子都会跑到教授这里来敦促你将你的教学内容付诸实施,参加罢课、暴动和诸如此类的盛举”。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报道说香港发现了珠江上游冲下来许多尸首,显然有很多人死于非命。但像毛泽东的那些号召‘炮打司令部’的内部谈话究竟是怎么回事?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似乎全然不可思议。而我也变得沉迷于毛泽东的举措寻找一个答案,因为在所有这些谈话中似乎贯穿着某种对一切都了然于胸的神秘哲学。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令人尤其迷惑的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个共产党领袖,自从斯大林死后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他居然会发动人们对自己的党进行斗争”。^{[1] (P177)}正是这种迷惑不解激发了魏斐德涉足毛泽东研究。

促使魏斐德涉足毛泽东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纪念他的导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60年魏斐德从法国返回美国后,由于十分仰慕列文森的声望和他的学术成就而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攻读远东史并于1962年获硕士学位,旋即于1965年在该校又获博士学位。魏斐德毕业后,即留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任教,成为其导师列文森的同事。然而,不幸的是,1969年4月6日,列文森在河上荡舟时落水身亡。列文森既是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对魏斐德的学术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魏斐德曾如是写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列文森在人格和知识上比我们认识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一个思想家。他对我们思想和工作上的影响一直是巨大的。实际上,对于整个一代研究亚洲历史的学生而言,他不仅使学生们很好地感受和理解过去的中国和她的心灵发生的革命,还使学生们感受到中国过去的辉煌和她衰落的痛苦。”^{[2] (P16)}列文森的去世使魏斐德非常悲痛,所以他要以他导师研究思想史的方式来研究毛泽东,以此纪念他的导师列文森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做的贡献。正如魏斐德生前的亲密同事和老朋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著名日本学研究专家埃尔文·沙伊纳(Irwin Scheiner)先生所说,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这本书是思想史领域里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当然是为了纪念对他极其重要的人——列文森”,“读一下魏斐德所撰写的《历史与意志》,你会发现这本书献给三个人:他的父亲、导师列文森以及我”。^[3]魏斐德的学生、同事、朋友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也曾提到魏斐德之所以研究毛泽东,“我认为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魏斐德先生写此书时正逢‘文革’后期,当时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都在谈‘文化大革命’,都非常想了解它;第二,他的导师列文森刚刚去世。列文森一直是研究思想史的,《历史与意志》所研究的就是典型的思想史。所以,此书的创作也是为了纪念他的导师列文森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做的贡献”。^{[4] (P29)}

就史学而言,材料(史料)是源头活水。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5] (P54-55)}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的新发掘。陈寅

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经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6] (p236)} 魏斐德涉足毛泽东研究与史料发现有着密切关系。他曾在斯坦福大学发现了毛泽东对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ederich Paulson)文章中译本所做的注解,这使他发现了毛泽东早期对西方哲学的反应和看法;同时,他还在斯坦福图书馆里发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小字报”、“内部参考”。^{[4] (p29)} 正是基于这些新发现,魏斐德产生了研究毛泽东意识形态的欲望。

二、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特点

魏斐德教授对中国明清和近代的历史及思想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研究》等论著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或许正是这种一般外国学者难得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养,使得他的毛泽东研究显得与众不同。具体言之,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由前所述,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源于当时在文化大革命观察者中流行的困惑: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and 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7] (前言)} 面对这种困惑,许多学者从革命政治的突发情况、高层的权力斗争、毛的心理冲动等方面来解释这一令人惊讶的事件。魏斐德没有拒绝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的争议或是心理学冲动方面,但是他的注意点在其他地方:他试图在可供毛泽东选择的思想背景中来寻求理解,同时探寻基于这些选择毛泽东的认知和行动方式。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所关注的主题既不是由知识、性格和经历合成的代表一个生命完整肖像的毛泽东个人传记研究,也不是毛泽东的理论观念本身或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而是为毛泽东勾勒一幅知识环境的图画。基于此,魏斐德用几章来讨论1936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到童年时代曾接触到的康有为思想及其在公羊学说发展中的地位;毛泽东坦承在长沙求学时代曾迷恋康德的理性主义,从而使魏斐德以大量篇幅解释康德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此外,在魏斐德看来,在考察毛泽东的认知和信念结构时,不仅要考察它融合了什么以及如何理解,还应考虑他拒绝了什么。为此,魏斐德探讨了朱熹和王夫之在对待知识与变化辩证关系的不同方式之间的论战,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理念,黑格尔的理性与现实的统一等。简而言之,魏斐德为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源流,详细梳理了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影响的诸如王阳明、康有为、格林、康德等思想家的主要学说观点,并比较和对照了中国和西方关于人和自然的学说思想。

魏斐德之所以将毛泽东的知识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施拉姆(Stuart R. Schram)、陈志让(Jerome Chen)、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人的已有研究虽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作了详尽的分析,但在魏斐德看来仍不甚满意。比如,施拉姆虽精确地证明了毛泽东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某种未必代表人类最终命运的东西”)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中某种“辩证法的癖好”的产物,但是这种癖好首先是怎样形成的并没有得到说明。因此,魏斐德认为探索诸如“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癖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问题。^{[7] (p2)} 另一方面,在魏斐德看来,思想的产生一般都受到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某种理论假设所支持,这些假设往往在行动者著作中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来。思想分析不能仅仅关注文本的表面语义,而更重要的是要展现“隐喻”文本的本质。只有对曾经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影响的诸多哲学源流进行分析,才能说明毛泽东思想之内涵的理论来源并透彻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第二,独特的研究方法。魏斐德在对毛泽东的知识环境进行考察以查明其思想来源时,运用的不是话语顺序,而是一组镜子的映像之方法,即运用由一系列曾对毛泽东产生过种种影响的理论观念构成的一组透镜对其思想加以分离和解析。正如魏斐德所说,“本书试图提供一系列内容,就像一组镜子的映

像”。^{[7] (p5)} 因此,《历史与意志》一书的第二部分,即以“思想的转变”为题,考察了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接触和学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康有为的思想;第三部分以“自由”为题介绍了毛泽东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过程中,通过其老师杨昌济学习和接受新康德主义的经历;第四部分以“必然性”为题,描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介绍了考茨基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分析其对毛泽东的影响。

魏斐德所提供的这些映像最终都聚集在“文化大革命”这一个焦点上。例如,对康有为学说的探讨,力图说明正是康有为、谭嗣同和梁启超一起将正统的儒家价值观转变为激进批判社会的独立意识形态。对康德思想学说的探讨也并非多余,尽管毛泽东从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那里汲取了“意志应该而必须是通过竞争才能取得理智的结论,不应忽视了任何一种必要的力量”这种观念,但正是康德使毛泽东相信意志是自由,理性是普遍的,并由此才能够将自己从历史现实的牢狱中解放出来。再如,对考茨基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影响的分析,说明关于历史对于人类的要求是什么以及人类对于历史的期望是什么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只是借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当的术语措辞,并融合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答案却明显是他自己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著作中这一关于必然性的论述给毛泽东的思想添加了决定性的成分(允许所有其他的力量在革命的严峻考验中结合起来),但我们也必须记住,这些早期的观点却可以使毛泽东相信一种远比马克思更加激进的连续不断的历史变化观”。^{[7] (p311)}

魏斐德希望通过运用透镜的方法,捕捉到毛泽东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思想特征的起源,并以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作出他的解释,“与历史并驾齐驱,决心与它斗争,也就是在理解历史的需要时承认它。毛泽东通过设置对立面而知道自己是战胜强敌的革命者,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英明主席”。^{[7] (p351)} 然而,魏斐德采用这种方法,读者必须将他的脱节分析片断融合在一起,这使得读者不得不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不断跳跃。魏斐德坦承,他的镜子方法要求读者具有非同一般的能力去综合和判断证据并尝试得出他自己的方向。^{[7] (p5)}

第三,鲜明的列文森范式。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让我们想起列文森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他们都是根据意识形态和文化遗产解释现代中国思想。正如周锡瑞所说,“《历史与意志》所研究的就是典型的思想史……书中体现了列文森主流意识:强调意识形态、儒家理念以及现代中国转变的重要性”。^{[4] (p29)} 列文森在成名作《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中通过分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士绅集团的态度变化来解释现代中国的思想,魏斐德则根据中国传统世界观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考察毛泽东的思想以解释当代中国。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曾如是指出,“列文森笔下的梁启超代表着现代中国的思想:他的犹豫是他们那代人共同的病症,他的困惑是一个时代沉重的负担。相类似,魏斐德笔下的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他的天才是超群的,他的意志是驱赶的力量。随着历史的前进,饥饿与希望、痛苦与困惑相应的在减少,归属于必要性之内。历史变成了历史。人们有时很好奇,这个民族到底发生了什么,蜂拥而至的各种民众蜕变成了毛主义的大众,他独自一人在安静的角落精算混乱,体现不容置疑的意志”。^{[8] (p312)}

另外,魏斐德所表现出来的高超技巧明显是列文森式:快速转换焦点,广泛的参考书目,并列展示不同的片断和主题。尤其是在列文森那里,我们总是能感受到一种辩证的张力。例如,列文森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中探讨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关系时,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9] (p4)} 提出了“历史与价值”和“理智与情感”的命题。同样,在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中,我们也明显感受到一种张力,作者描述了“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但强调“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认为“没有意志,无所谓历史;而没有历史,也就完全没有意志”。当然,魏斐德与列文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延续了列文森没有做到或没有尝试的地方。列文森花费相当努力论证梁启超更多的是一种悖论——他是一位情感与实践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思想家。相反,魏斐德则以一种难得的耐心主观上证明了毛泽东对现实的见识与他努力付诸实施之间存在一致性。

三、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评价

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在美国学界引起了不小争议。科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指出,“尽管其他学者已经考察过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但是魏斐德还是开掘出了众多新方面。他对哲学史的把握给人以深刻印象,他的著作在这一领域应视为具有最终决定意义”。^{[10] (p244)} 约翰·F·科珀(John F. Copper)认为,“《历史与意志》是一本刺激但需细致阅读的著作。它尝试通过哲学视角追寻毛泽东同西方的关系,并解释毛泽东是如何将其意识形态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它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是根据他的唯理论哲学观解释最近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大革命。这确实需要作者拿出勇气,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轻率。魏斐德要么夸大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要么证明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笔者的观点是它属于后者”。^{[11] (p175)} 戈登·班尼特(Gordon Bennett)评论道,“对于任何一位想寻找一本理解中国意识形态或毛泽东思想的最新著作,我推荐选择这本。试图跨越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史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明显不同的主题,这是第一次。更为重要的是,魏斐德的才识和跳越风格。他的研究是值得向在其他方面具有自己才识的中国意识形态专家推荐,它也为中国研究的实践者提供了好的思想食粮”。^{[12] (p815)} 格里德亦认为,“由于其结构与方法,《历史与意志》是一本难读之书……魏教授给我们所提供的事实上是一系列可能性。这是诱人的,但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然而,魏斐德解决了摆在这位思想史家面前最为艰难的任务:他使他的课题具有可信性。这是一本不仅对某一领域作出贡献而且有助于确立目标和标准的一本少有的著作”。^{[8] (p310-313)}

然而,在 Ignatius J. H. Tsao 看来,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一书“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明了作者究竟要引向何方。基于此,我们认为这本受欢迎的著作是中国研究领域的预示者而非终结者”。^{[13] (p361)} 施拉姆委婉地评论道,“基于论题的重要性以及作者的天才,他非常值得阅读,但可能最后留下的印象是一本带有瑕疵的杰作:迷人且具启发性,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太令人满意。……魏的镜子对于现实投射出许多迷人的侧面,但他们并不能取代现实本身。我们希望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下一个贡献中,这位历史学家将再次显示他自己是一位哲学家,给我们拿出一本不仅谈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而且对其进行解释的著作”。^{[14] (p670-672)} 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对魏斐德的观点及方法都提出了他的批评,“问题并不在于他忽略了我倾向于认为应该包括诸如自由、发展等主题,而是他的方法无法处理与这一课题相关的近在咫尺的事件。……魏的成就在于他建立了一种依赖于未来学者的贡献来衡量其正确性的标准。他的结构类似于知识分子消瘦的腿,在讨论中国和西方思想一章的结论中有时不过是一个短语,以致我无法不怀疑,他的作为本书组成部分的关于毛主义起源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以赢得更多读者的广告语,而不是像这本厚重著作中其他章节那样具有深刻的实质内容;在一页一页仔细地考察魏斐德所做的讨论,发现他探讨的主题实际上是关于东方与西方的比较哲学”。^{[15] (p453-456)}

今天,当我们重温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著作时,依然能发现其不乏可取之处。比如,魏斐德在著述时引证的资料来源非常多样,既有中文的经典著作和近代学人著述,也有日文、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著作。再如,建立在厚重资料基础之上,魏斐德提出了一些对我们来说很有启迪意义的独到分析和观点。他在全书第一部分用“蒙太奇”作标题,剪辑了如“革命奠基人”、“红太阳”等一些重要镜头,以此来说明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革命家或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个“由他的思想所表现的人格面具”。魏斐德没有承认致力解决毛泽东是怎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问题,但他不仅关注到毛泽东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众多相似性,而且他也注意到一些差异。他写道,“毛的马克思主义是另外一种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毛来说,达尔文主义先于马克思主义成为他青年时代的主要科学发现”。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下面观察: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不要做利己主义者等等,但是毛主席语录却充满了这样的要求。所以,作为一个道德哲学家,毛泽东受某些中国人思想倾向的影响比受欧洲人思想倾向的影响要深得多。^{[7] (p347)} 在他最富启发性的第二部分“思想的转变”中,他认为19世纪中国思想的发展要比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从

欧洲流传过来的思想更为流行。康有为用达尔文进化论原理来重新解释中国人的思想。不过,一旦达到了目的,他就不再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在分析马克思之前西方哲学著作对毛泽东影响的第三部分中,魏斐德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观的成熟是直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而不是通过俄国共产主义这一中介。值得一提的是,魏斐德采用一组镜子的映像之方法去把握毛泽东思想来源这具有多面性主题,这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一次大胆尝试。正如施拉姆所说,“由于中国革命在意义和过程方面具有相互作用和重叠的不同层面,所以像这样非传统的方法可能更适合”。^{[14] (p670)} 弗里德曼也认为,魏斐德的方法“如此巧妙而富有启发性”。^{[15] (p456)}

当然,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来审视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时,可察觉到其存在的明显缺陷。比如,魏斐德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毛泽东阅读过考茨基著作。难道因此考茨基就应该为毛泽东的“连续革命”这一意识负责吗?革命观念是一过程而非千禧年事件。另外,毛泽东告诉我们,他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和他对西方伦理道德的评论了解到布拉德雷和格林的新黑格尔主义。然而,值得反思的是,布雷德拉关于经验来自现实以及合理的怀疑主义在多大程度上传递给了毛泽东,启发他将真正的革命转化为无休止的斗争过程?格林的意识提高或社会与自我发展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察觉到毛泽东的革命观是大众意识的产物。再如,毛泽东通过杨昌济接触到泡尔生的伦理学思想。泡尔生将自我定义为“意志,增强意志的方法是抗拒自然,而不是听其自然”。任何了解他的政治哲学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是坚信伟大成就来自于伟大挑战,他曾在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如是批注道,“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7] (p212)} 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毛泽东这一观念来自泡尔生?也许泡尔生仅仅只是强化了毛泽东已存在的观念。我们如何知道这种观念不是毛泽东从乡村民间政治文化中获取或是在与他父亲的心理斗争中产生或是从一本毛泽东批注过但没有幸存下来的书中了解到?思想的起源是难以捉摸的事情。这些颇具深刻性的困惑,魏斐德明智地没有把它们掩饰为理所当然。他目的是将其设定为可能性。但是,如果这些事情都是可能,那也存在其他可能,可能性的边界在哪里?更为严重的是,在理论上存在许多问题。学者李君如曾指出“其一,它的前提是否认毛泽东的思想在1920年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即在清理批判当时所受各种思想影响的基础上从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这一决定性的思想转变,根本不可能对毛泽东此后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任何合理解释。其二,它实际上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过程置于研究视野之外,这就使毛泽东一生的思想经历中出现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断层。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一个人的思想发展中出现这样一种断层简直不可思议,而书中并未就此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其三,即使假定在毛泽东早年知识环境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这种联系在几十年的断层时期采取什么表现形态、以何种方式维系着并发挥作用,这也是应当加以阐明的重要内容。但是,书中并未提供具体的文献资料和明确的分析论证,有的只是一些暗示和联想。其四,如果认定‘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主要是在毛泽东早年的知识环境之中,随之产生的问题便是,这些长期潜伏的思想要素为什么偏偏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显现出来,而不在此前任何时期发作起来?”^[16]

魏斐德的毛泽东研究启示着我们,由于毛泽东是一个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复杂历史人物,也由于他对现代中国之思想、制度和社会具有不可磨灭的深刻影响,对西方人来说,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不断且颇具吸引力的学术领域。当然,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论目标、社会功能和学术立场,不可能以西方经验作为自己的基本模式,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忽视西方所涌现出来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因为西方学者基于其从西方社会结构中所衍生出来的学术传统和问题旨趣不只是一个可供比较的重要的参照对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西方学者在研究视角、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通过了解相异的观点与方法,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鉴,汲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这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事业。

参考文献:

- [1] 邹羽采访 徐有威整理. 我们这一代汉学家——魏斐德教授访谈录[J]. 史林 2008 (4)
- [2] Joseph Richmond Levenson. Modern China: An Interpretive Anthology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 [3] 王平采访. 魏斐德的治学与中国史研究——访埃尔文·沙伊纳教授[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 - 04 - 30.
- [4] 王平采访. 世界的魏斐德: 中国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周锡瑞教授访问记[J]. 历史教学问题 2009 (4) .
- [5]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7.
- [6]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7] 魏斐德. 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8] Jerome B. Grieder.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 tung ' s Thought. by Frederic Wakeman [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3 ,No. 2(Feb. ,1974) .
- [9] 约瑟夫·阿·列文森. 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 [10] Colin Mackerras.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By Frederic Wakeman [J]. Pacific Affairs ,Vol. 48 ,No. 2(Summer ,1975) .
- [11] John F. Copper.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 tung ' s Thought by Frederic Wakeman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14 ,USA - USSR: Agenda for Communication (Jul. 1974) .
- [12] Gordon Bennett.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 tung ' s Thought. by Frederic Wakeman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6 ,No. 3(Aug. ,1974) .
- [13] Ignatius J. H. Tsao.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 Tung ' s Thought by Frederick Wake- man [J].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Vol. 15 ,No. 4(Dec. ,1975) .
- [14] Stuart R. Schram.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 tung ' s Thought by Frederic Wakeman , Jr [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1 ,No. 2(Jun. ,1977) .
- [15] Edward Friedman. Review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 - tung ' s Thought. by Frederic Wakeman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24 ,No. 4(Oct. ,1974) .
- [16] 李君如. 探讨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知识环境——魏斐德《历史与意志: 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新版序言[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4 (3) .

(责任编辑: 郭荣华)